

劳动何以塑造中小學生人格

——基于省域内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雪纯 姚继军 周世科

【摘要】促进中小學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是满足新时代人才培养需求的重要工作。基于中国江苏省2020年基础教育學生学业质量监测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及泛精确匹配法分析后发现,家务劳动习惯的培养是一种投入小、边际效益高的家庭教育,经常做家务劳动有助于學生在大五人格五个维度上的全面发展,对未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的培养等方面均有着重大的意义。建议要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促进學生非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真正实现“减负增效”,培养身心健康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劳动教育;學生非认知能力发展;减负增效

【作者简介】王雪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姚继军(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210024);周世科,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10013)。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科学研究》(京),2022.11.48~56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小学STEM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18YJA880108)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强调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将对劳动教育的重视提高到了历史新高度。

与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不同,现实中的劳动教育却并不令人满意。相关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普遍存在劳动参与不足、劳动形式单一等问题,这导致勤俭、奋斗和创新的劳动精神式微,对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和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1]。在学术研究层面,当前大多关于學生劳动的研究为思辨研究,缺少设计良好的严谨实证研究。这使得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劳动教育在青少年发展及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进而影响了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江苏省2020年基础教育學生学业质量监测数据,借助OLS回归及泛精确匹配法(Coarsened Exact Matching,简称

CEM)分析中小學生家务劳动参与对孩子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在准确刻画家务劳动对中小學生人格发展影响的基础上,为改善相关教育政策及推进家庭劳动教育提供研究依据。

一、研究设计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2020年基础教育學生学业质量监测数据(以下简称省测数据)。测试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2020年的测试对象是五年级和九年级的學生。问卷同时收集了学校领导、教师、家长和學生的相关信息。本次省测共抽查五年级學生214205人,九年级學生147805人,为本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数据资源。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匹配后,剔除了没通过测谎题、相关重要信息缺失或数据存在明显异常的样本,最后得到103507个小学有效样本和100998个中学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學生的“非认知能力”。采用大五人格理论中的人格五因素模型来界定學生的非认知能力。测量问卷中“非认知能力”部分

的测试题项主要改编自中国版 10 项目大五人格量表 (TIPI-C)^[2], 该量表在美国心理学家 Costa 和 McCrae 1987 年编制的 NEO 人格量表基础上修订, 较之原量表更为简洁, 且信效度良好, 更加适用于本研究中年龄较小的研究对象。经过对量表的测试、完善, 最终应用于 2020 年省测。量表信效度良好, 其中, 小学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的 α 值分别为 0.714、0.645、0.678、0.674、0.605, 初中的为 0.741、0.723、0.676、0.750、0.703, 满足研究需要。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学生“是否经常参与家务劳动”的二分变量。在本次省测的问卷调查中, 询问了学生“最近一个月你做家务劳动的情况是”这一问题, 学生可回答“从不”“偶尔”“经常”“总是”。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学生是否经常参与家务劳动的影响, 同时拟采用匹配方法, 因此, 为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影响并提高分析精度, 将选择“从不”“偶尔”的学生, 划分为“不经常参加劳动”样本, 并赋值为“0”; 而将选择另外两个选项的学生, 划分为“经常参加劳动”样本, 并赋值为“1”, 在此基础上构建对照组和干预组, 并进一步运用匹配方法进行分析。

3. 控制变量

在分析的过程中, 本研究控制了学生个人特征、学生家庭背景、学生参加补习时间、家庭作业时间、是否住校、城乡等混淆变量。学生家庭背景特征中的父母学历变量基于其受教育年限处理为连续变量。而在父母职业方面, 基于李春玲等人的研究, 笔者采用专家赋值法, 对父母职业用职业声望得分来进行赋值。^[3] 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 由个体的家庭拥有物多寡来表征, 并通过去纲量化将家庭经济变量的原始值处理为 0~1 之间的标准化值。同时, 考虑到城乡、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 笔者在模型中纳入了城乡、区域等哑变量。

调查可知, 样本中 76.9% 的小学生经常参加家务劳动, 而中学阶段这一比例为 46.3%。初中生不仅住校比例远高于小学生, 其平均每天在家庭作业上花费的时间为 2~3 小时、在课外补课花费的时间为 1~2 小时, 远高于小学生的 1~2 小时和 1 小时。小学阶段的学生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得分均值分别为 4.373、4.299、4.366、4.505、4.222, 初中阶段的学生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得分均值分别为 3.962、3.124、3.715、4.174、3.520。可见, 初中生的家务劳动参与率要显著低于小学生, 课业压力高于小学生, 而非认知能力发展情况普遍低于小学生。

这一结果与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近期发布的首个国际性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测试结果 (简称 SSES 调查) 相符。^[4]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都在降低。

(三) 模型设定

由于诸如家庭经济背景等混淆变量可能会导致有偏估计, 为此, 常需要运用“匹配”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但目前最常用的倾向得分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简称 PSM) 对数据有着较高的要求, 需通过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域检验, 因而常常会出现匹配失败的情况。^[5] 本研究在前期的分析过程中发现, 所用数据难以满足 PSM 的要求。因此, 笔者选择用泛精确匹配方法, 来消除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误差, 提高分析精度。

CEM 方法相对于其他匹配方法的优势在于分组标准的可预知性, 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来界定变量的分组标准, 在设定模型之前选择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最大不平衡, 无须检查匹配后协变量的平衡性, 调整一个变量不会影响任何其他变量, 从而在大大提升匹配的效率的同时, 减小了对模型的依赖程度, 降低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误差, 在符合一致性原则的前提下将数据很好地限制在共同支持的范围内。另外, CEM 在匹配过程中还会产生权重变量, 且对匹配前后两组的样本数量不作相等要求。这就使得原样本在最大限度地被保留下来的同时, 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以解决, 模型的分析精度得以提高。^[6-7]

因此, 本研究利用泛精确匹配方法, 先通过计算得出带有权重的核心解释变量, 随后将其带入回归模型, 重新进行加权回归。本研究纳入泛精确匹配的特征变量有性别、是否独生、城乡类别、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声望、家庭经济背景水平、是否住校、家庭作业花费时间、学科补课花费时间。具体模型见式 (1), 其中 AveGrades_i 为第 i 个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得分, β_0 为模型的截距, Lao2_i 为第 i 个学生是否经常参加劳动情况, X_i 为学生在控制变量上的得分。β₁ 和 β₂ 为各变量回归系数, ε_i 为残差

$$\text{AveGrades}_i = \beta_0 + \beta_1 \text{Lao2}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text{cem_weights}] \quad (1)$$

二、回归结果

(一) OLS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学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特征、区域特征、是否住校、完成家庭作业花费时间和参加学科补习花费时间后, 是否经常参与家

务劳动与中小学生大五人格测试的五个维度均呈现显著正向相关。相较于不经常参与家务劳动的学生,经常参与家务劳动的学生在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性得分分数上平均要高0.25~0.52分。

(二)控制选择偏误后的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泛精确匹配技术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泛精确匹配输出的L1值(Multivariate Imbalance Measure)表明了数据的不平衡程度,L1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数据的不平衡性越高。研究者可以根据L1值的变化判断匹配效果,L1下降得越多,说明匹配效果越好。^[8]

泛精确匹配后小学保留了24117个有效样本,初中保留了43511个有效样本,分别占原有样本的23.3%和43.1%,L1值分别从0.87和0.74从下降为0.52和0.34,说明本研究在获得较好匹配效果的同时,也保留了较多的样本。

此外,进一步将得到的带有权重(cem_weights)的变量带入回归模型进行计算,结果显示,经常参加劳动对小学生和初中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后均有所提高。具体而言,在代表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大五人格测试五个维度的被解释变量上,由其他控制变量影响学生是否经常参加劳动而造成的差异平均下降了0.001~0.019,说明泛精确匹配技术较好地纠正了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偏误。对小学生来说,是否经常参加劳动显著影响非认知因素。其中,对其责任心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大,为0.515;外倾性的系数大小紧随其后,为0.510;然后是开放性,为0.482;神经质性,为0.470;宜人性,为0.381。对初中生来说,是否经常参加劳动对其非认知能力五维度影响从大到小分别是外倾性、神经质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系数分别为0.450、0.377、0.374、0.289和0.246。虽然在五个维度中宜人性的系数相对较小,但其匹配前后的变化最大。这也说明在控制变量中有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

在控制变量中,不论对于小学生还是初中生,非独生子女、城市背景、父母受教育年限更高、家庭经济背景更好的学生在大五人格五个维度测试得分上均高于独生子女、农村背景、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经济水平更低的学生。区域因素和是否住校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影响效果不同。父母职业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多表现为不显著或系数较小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作业花费时间,不但对初中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没有显著

影响,且家庭作业花费时间越多,越会显著负向影响小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学科补课时间仅会显著影响中小学生的开放性和初中学生的神经质性,对中小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其他大五人格维度均无显著影响。

(三)数据分析的结果讨论

本研究对参与家务劳动与学生大五人格五个维度得分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一步利用了CEM匹配方法,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可能带来的误差。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经常参加家务劳动对中小学生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性的发展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常参与家务劳动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代表数据不平衡程度的L1值,在匹配后下降了0.35~0.40,表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教育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认为,家庭教养方式在发展孩子人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10],而教孩子做家务劳动是家庭教养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推断,经常做家务劳动之所以能提高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家务劳动本身锻炼了孩子的生活技能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同时也让家长发挥了积极家庭教养方式的作用。具体而言,教孩子从不会到会做家务劳动的过程,就是促进孩子在面临新事物时学会独立思考、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孩子不墨守成规,发展孩子的开放性、培养责任心。同时,教孩子做家务是一种需要与家人配合的亲子互动,有助于提高孩子的社会化能力,从而提升孩子外倾性、宜人性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父母给子女的陪伴越多,子女情绪越稳定、越容易友好地与人相处、适应环境。^[11]而家务活又是每个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活动,如果孩子连家务活都不参与,其在家中的参与感必然不高,进而不利于其精神状态的稳定。

由匹配后的结果可看出,住校对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是有着显著微弱的负向影响的。这也表明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家庭教育在塑造孩子健康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家务劳动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影响途径和方式,在帮助孩子树立良好的心理环境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2]一些学校管理者所提倡的“军队化管理”^[13]由于片面强调了学校教育的“刚性”,或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我们认为,对于提供住宿服务的学校,在要求孩子把学校当作自己家的同时,也要真正做到能给孩子提供“家”的氛围,补偿孩子家庭教育的缺失,应当以“人性化”的方式管理学校,让孩子把学校当

成“家”。

劳动是塑造人格与品格、实现中小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之所以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劳动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帮助后续的研究探究家务劳动对学生发展的机制。而本文尚未对家务劳动影响非认知因素的机制作充分的分析,未能探讨出最合适的家务劳动的时长以及方式,这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予以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江苏省 103507 名五年级学生与 100998 名九年级学生的数据,以中小学生大五人格五个维度测试题的均分作为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被解释变量,利用 CEM 分析了经常参与劳动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小学生家务劳动参与情况并不理想,有 23.1% 的小学生和 53.7% 的初中生不经常参与家务劳动。在家务劳动对非认知能力发展影响方面,经过泛精确匹配处理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所处地域等方面均相似的学生,经常参与劳动的小学生比不经常参与劳动的小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平均分要高 0.47 分左右;初中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平均分要高 0.35 分左右。这说明经常参与家务劳动对于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学生的学业负担对其家务劳动参与存在着明显的“挤出”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家长对学业的焦虑是影响其子女家务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要进一步强化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需要社会、学校、家长多方施力,共同努力,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学生人格品格完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家庭教育观和教育策略方面,家长应该着眼孩子全面、长远的发展,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而非过于功利化地追求短期的成绩进步。同时,要提高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主动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家庭教育应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为核心,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进家庭教育策略,促进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与其报名多个课外补习班,不如教孩子学会做家务,让孩子承担起他们力所能及家务的一部分。诸如整理房间、扫地拖地、洗碗擦桌子、自己洗衣服、买生活用品、烧菜做饭等,这些都可以增加家庭成员沟通交流,让孩子获得完成任务后的成就感,而在诸如垃圾分类这样

的活动中,在增加孩子相关知识的同时亦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从社会角度出发,应当采取多方合作的方式为孩子创造更多劳动教育的机会和资源。政府和社会需加强劳动体验和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充分利用青少年宫、实践基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社区等社会教育资源,构建体系完整的、体验式的学生发展指导课程,加强资源整合,推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及各类教育的互联互通,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参与的机会。学校层面需改革并完善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严格落实“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同时,增加学生劳动实践参与的时间和机会,探索多样化的家庭作业形式,变“写”作业为“做”作业。加大对家庭劳动教育的引领与指导,通过家校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家务劳动参与,培养劳动精神和劳动技能。

参考文献:

- [1] 张艳芳. 中小学劳动教育建设的困境、思考和实践[J]. 教育观察, 2020(47): 47-49.
- [2] 李金德. 中国版 10 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11): 1688-1692.
- [3] 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 社会学研究, 2005(2): 74-102, 244.
- [4] 徐瑾劼, 杨雨欣.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国际比较: 现状、影响及培养路径——基于 OECD 的调查[J]. 开放教育研究, 2021(5): 44-52, 120.
- [5] Paul, R.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1): 41-55.
- [6] Stefano, M. Multivariate matching methods that are monotonic imbalance bound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1(493): 345-361.
- [7] 陈纯槿, 顾小清. 网络游戏对学生学科素养与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 PISA2015 中国四省市测试数据的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2019(5): 73-87.
- [8] Iacus, S. M. Causal inference without balance checking: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J]. Political Analysis, 2012(1): 1-24.
- [9] 王中会, 罗慧兰, 张建新.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特点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6(3): 315-317.
- [10] 曲晓艳, 甘怡群, 沈秀琼. 青少年人格特点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3): 288-290.
- [11] 黄树香, 班兰美.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J]. 保定学院学报, 2011(1): 106-109.
- [12] 孟薇薇.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魅力[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168-169.
- [13] 朱文艳. 我的教育理想[J]. 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 2014(11): 67.